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

魏巍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

魏巍 〇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曹 利

封面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魏巍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072-6

I. ①中… II. ①魏…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245 号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

ZHONGGUO DANGDAI SHAOSHU MINZU NÜXING SHIGE YANJIU

魏 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16072-6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顾 问：黄蓉生 张卫国 崔延强 靳玉乐

主 编：吕 进

副主编：熊 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本益 段从学 江弱水 靳明全

蒋登科 李 震 梁笑梅 陆正兰

吕 进 王 珂 王 毅 向天渊

熊 辉 颜同林 张崇富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探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此可经至今且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现代诗学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女性诗学传统的当代转型 005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女性诗学话语的演变与突破 005

第二节 性别：女性意识的崛起与复活 013

第三节 族群与故土认同：民族身份的诗学价值 027

第四节 英雄崇拜与族群认同：萨仁图娅《千年风云》论 036

第五节 以我命名：艾儒木诺论 046

第六节 王雪莹诗歌的古典情怀和现代女性意识 055

第二章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 067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女性诗歌资源 067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诗歌的民族化困境 076

第三节 失落的美学：殊异与共生——从《诗歌风赏》说开去 ... 085

第四节 创伤记忆与黑暗意识：冉冉论 100

第三章 文学制度与族裔认同 118

第一节 文学制度与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繁荣 118

第二节 颁奖制度与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认同 127

第三节 族裔认同：永不停歇的拉锯战 134

第四节 鲁迅与骏马的比拼：娜夜突出重围 141

第四章 地域、性别、欲望书写与文化认同	151
第一节 少数民族女性诗学的空间维度	151
第二节 区域诗歌与诗歌的区域化书写	159
第三节 城与人：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空间地理学	170
第四节 时间的叙事：少数民族女性诗歌中的时间	184
第五节 “七里香”：席慕容论	196
第五章 反向逆转：世界的就是民族的	213
第一节 族群、代际文化差异与族裔认同危机	213
第二节 私人性、公共性与日常性	222
第三节 “共同文化”的分裂：从民族之名到地域之名	234
第四节 在时光的鳞片上：娜仁琪琪格、苏笑嫣母女论	240
余论：走向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学	248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255
丛书后记	257

绪 论

不止一个人说诗歌应该属于女人。藏族女诗人桑丹说：“有些人，特别是某些女人，天生更能适应在诗歌的河流上行走。”^① 回族女诗人马兰则说：“女人天性更接近诗歌。诗歌可以属于女人。”^② 而壮族女诗人黄芳则把这种说法推向了极致，并为这种说法给出了明确的理由：“实际上，女人天生就更适合做诗人。因为她们更敏感，更细腻，更善良，也更富于诗意。”^③ 这些对女性写作的肯定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初衷？她们的书写与男性书写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张力？难道女性写作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为什么是诗歌可以属于女人或者更适合女人？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问题上，她们这样的立场对当下诗歌具有什么样的启示？这可能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马兰所谓的“诗歌可以属于女人”，是因为“以前都是男人在写女人的性，现在女人总算自己写自己了，这满好的，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多”^④。马兰把女性诗歌写作的合理性建构在女性对性的书写上，认为这是平衡男女两性书写的最好理由，也是女性对男性书写女性性行为的反拨。任何男性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女性去书写她们的性体验，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若是就此把当代女性诗人们存在的合理性仅仅归结为对性体验的书写，则显然缩小了她们存在的价值。对众多的女性诗人们来说，诗歌写作还有更多的存在价值。她们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写作，还可以为自己的精神写作，更深层意义上，她们还为自己的“良心”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女性诗歌写作只有超越自己的身体，上升到精神层面，女性书写才不会被认为是

① 桑丹：《生命中的美丽——梅萨侧记》，黄礼孩、江涛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2005年第8期，第49页。

② 沈睿、马兰：《戏剧生活——马兰访谈》，同上刊，第121页。

③ 黄芳：《生活在母语之外》，同上刊，第295页。

④ 沈睿、马兰：《戏剧生活——马兰访谈》，同上刊，第122页。

“次一等”的书写。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虽然如中国的民族一样呈现出众多的文学形态，但是，从根子上来说，我们还是可以从性别与族群两个方面来对她们的创作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扫描。无论是性别意识还是族群意识，我们都不应该把它们固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而应该看作后天养成的，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树立这样的观念有利于我们在发展的视野下去认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不仅认识她们的过去，也更有利于预测她们的未来。

从这种发展的视角去认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创作，不仅要关注她们对性别角色扮演的认识，也要关注她们对族群认识的发展，不仅是族群之间，还包括族群内部代际之间的认识的发展。

当然，无论是性别认同还是族群认同，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要以一个具有“共同体”的概念来统辖各种现象，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性别认同抑或族群认同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以这两个概念来认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要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去发现它们的缝隙。

在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碎片化、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现代生活的今天，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正逐渐消失，文化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风情作为与汉文化不同的存在，在满足想象性猎奇的基础上被接纳，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文化不只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与统一，它同时也意味着两者间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同化。尤其是在经济时代，随着所有民族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众多的少数民族个体为了生计进入城市生活，这种文化同化现象就更加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形态。在经济面前，任何民族都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正如黄礼孩所说：“在所谓‘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的全球意识下，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正在改变，朝着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很多纯朴的思想和肃穆的审视已被全球性的商业化所浸染。”^①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我们总是抱着

^① 黄礼孩：《被忽略或被忘却的少数民族女性诗歌》，黄礼孩、江涛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2005年第8期，第1页。

矛盾的态度，尤其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一员，这种矛盾心态就更为明显：一方面，我们希望少数民族能够尽快现代化，享受到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福利，改变经济上所面临的贫困与落后；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任何试图改变少数民族现状的行为，我们又带着深深的疑惧，唯恐变化太快，我们的灵魂跟不上这变化的节奏。

或许，黄礼孩所勾勒出来的一切，包括我自身生发出来的疑惧，都可能只是现代知识分子无中生有的产物，可能正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共同体。把少数民族文化当作全人类最后的精神避难所，这是有厚古薄今的嫌疑。就算退回到原始社会，人类也不可能避免相互间的战争与杀戮，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为现代经济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染是不公正的。这样的论断只是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族群之外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差异，而没有关注到族群内部之间的冲突与差异。任何一个族群共同体，都不是通过族群内部自然而然获得的，而恰恰是在与外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中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中，族群文化通常与地域文化相混合，这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民族文化的呈现，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结晶。因此，在关注类似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不能囿于某种狭隘的民族话语，而应在更为阔大的视野中来把握。否则，少数民族文学就真的只是作为多民族话语的一种补充和点缀，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把少数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是葛根图娅，她对蒙古草原、海子的消失，对沙漠、戈壁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失望与失落，对回不去的家园的疼痛感，表现出少数民族遭遇现代性之后的精神困境，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的不可名状的焦虑感。

而更多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人的写作则表现出对文化同化的顺从甚至于享受这种同化所带来的快感，诸如满族诗人从容、匡文留、娜夜、草人儿，回族诗人沙戈，蒙古族新生代诗人苏笑嫣，土家族诗人冉冉等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已经不再从少数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中获得诗意表达的空间，而是在已经被同化了的民族语境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更多时候，少数民族女性诗人们对族群的回望只是她们在都市生活中寄寓乡愁的一种方式，比如蒙古族诗人娜仁琪琪格对拒马河、大凌河、香磨村的书写，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对德昂村寨的书写，满族诗人王雪莹对辽西的

回望等。从族群认同到具有地域性的乡土认同再到都市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学正经历着一个与这个命名相背离的过程。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不可能逆转现代性生活所带来的一切弊端，对她们的研究也不可能纠正我们当前所遭遇的一切现代化困境。我们显然不能认为所有当前遭遇的问题都可以依靠维持少数民族文化的“淳朴”特性来解决，并把它当作拯救世界的最后救命稻草。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来作出某种比较的。具体而言，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既不是武器，也不是盾牌，它就是它存在的状态。我甚至只能认为，它是最无用的最后的表达方式。

但是，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关注，不仅是因为它与汉族文学一起构建了我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民族人，我们应该知道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这与是否需要振兴民族文化无关，而只是单纯认识论上的东西。每一种文化都不应该被遗忘与被忽视，它们都有得到表达的权利与机会，这是任何强势文化都不能遮蔽与代替的。

因此，在本书中，我力图勾勒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发展趋向，把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发展放到全球化视域下，从文学外的制度影响和文学书写的内部发展机制来探讨其当前和未来的走向。在城市化建设加速、全球一体化逐渐延伸至各少数民族内部之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命名或许会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会危及这一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对文学来说，这些或许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问题或许是，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将会越来越同质化，这会抹杀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当然，这种担心可能也是多余的，只要我们感受世界的心灵没有僵化至死，文学的表达就永远不会千篇一律。这，或许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力量之源。

第一章 女性诗学传统的当代转型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女性诗学

话语的演变与突破

在中国，女性诗歌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女性文学创作并没有形成规模，有论者把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权宗法制的影响，认为“封建性别文化把家庭建设成为女性的牢笼，剥夺了女性受教育、应科举、入朝政等几乎一切户外活动即社会性活动的权利，用‘无才便是德’的一枚奖章，力图杜绝和限制女性智慧的形成和发展”。^①历史地来看，这样的论断诚然能够说明中国古代女性诗人在创作数量甚至质量上的某些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论断按之于现代女性文学，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将结论推而广之，或者进行逆向思维，则会引发很多的问题：第一，既然古代女性诗歌的不发达是因为“男权”问题所困，那么当代女性诗歌的繁荣是否就意味着女权的觉醒？第二，如果说当代社会给予了女性在“受教育、应科举、入朝政等几乎一切户外活动即社会性活动的权利”，那么是否受教育只是应试入朝的铺垫？当女性拥有这些条件之后，当代女性诗歌是否就一定能够超越前人进入全盛？这个问题论者本人也注意到了：“元代明代清代，女性作家的数量似乎是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有袁枚这样一些进步诗人的推波助澜，更形成才女媛诗风起云涌之势，妇人之集，数逾三千，蔚为文坛壮观。”^②单纯从写作的数量上来衡量女性写作的成就，多少有些以偏概全的嫌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必

① 谭邦和：《媛诗九美赞论（代序）》，谭邦和编著：《媛诗九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要重新思考女性写作,具体来说,就是女性诗歌创作在历史发展中的变与同。

对于中国的女性诗学来说,伤春悲秋、沉浸在个体化的感受中是她们的主要写作方式。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诗作,虽然“在反映汉末离乱的感性程度上,可以说是超过了其他的作品”^①,但在诗文的核心情感上,她与之后的李冶、薛涛、鱼玄机,以及李清照、朱淑真、黄娥等女性诗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都是因感时伤怀或者离愁别绪而作,而并没有真正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

真正把女性诗歌推向与历史结合、与时事相抗争的人是秋瑾。在秋瑾的诗作中,国家的命运就是诗人自己的命运,她把自己的命运建构进了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旧时景物旧时楼,今日重来宿雨收。小庭花草犹如是,故国亲朋好在不?南地音书频阻隔,东方烽火几时休。不堪登望苍茫里,一度凭栏一度愁。”(《旧游重过有不胜今昔之感》)在秋瑾的诗歌中,国家大事不再是一件仅仅与男人有关的事情,而是与女性也息息相关的事情,正所谓“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感事》)这是一件“存亡家国总关情”(《柬志群》)的事情。

如果从秋瑾来反观之前的女性诗歌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一是国家观念在女性诗歌中的正式兴起;二是男女平等意识的出现。这些思想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历史地来看,如果我们具体到女性问题,这种把自身建构进整个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观念对女性来说是否一定就是一个进步,则又另当别论。

当然,对于中国女性诗歌来说,类似于秋瑾的现象毕竟只是个例,她只是因缘际会中的个别现象,更多的还是上承古代而来的小儿女抒情,现代的陈敬容、林徽因,当代的梅绍静、舒婷、翟永明等人,依然回归到个体性抒情的传统女性叙事上来。从这一方面来看,被学界归入“朦胧诗”派的舒婷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或者说,再没有比舒婷更不“朦胧”的朦胧诗了。但是,正是舒婷,把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再次展示在读者面前。

^① 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如果说秋瑾的诗作中突出的是男女共同“分担”意义上的平等的话，那么，在《致橡树》中，舒婷则不仅要求“分担”义务与责任，同时还要求“共享”幸福与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要求“共享”是比“分担”更为进步的女性观念。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面对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女性被解放出来，成为男性民族国家话语的有力补充，但是，这种解放并非出自男性对于平等意识的推崇，更非女性对两性平等的理论自觉，而仅仅是男性为自身利益着想的权宜之计。想想《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那种“我是我自己的”娜拉似宣言最后终于证明了女性的所谓解放，不过是男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罢了。这样的“女性解放”，在深层意义上还是要求女性去“分担”而不是“共享”。这种“分担”理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越来越臻于极致，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要求女性像男性一样成为革命的栋梁，甚至要求女性比男性付出更多。表面上看，这是两性平等的终极想象，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冒着浓烟的火坑：在生理上与男性有着根本差别的女性，如何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如果说我们一直批判的封建文化是桎梏与戕害女性的一个火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把女性从一个火坑中拯救

出来,然后再把她们投入另一个火坑,还让她们心甘情愿地承认这就是“解放”,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如何还敢承认中国的女性意识开始复活甚至觉醒?现在,舒婷的“木棉树”形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续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论资源,但又注入了她自己对两性平等意识的“共享”体验。这种体验是全新的,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体验。

很大意义上,古代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把握是不自知的,虽然古今诗人的诗作都来自他们对切身的情感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对于之前的女性诗人来说,并没有形成与周遭世界的互动性思考,这种思考对于接受现代启蒙思想的人来说相当重要,其意义在于,通过这种互动性思考,我们能够准确地定义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种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关注两性平等问题并非女性诗学话语的全部,尤其是当两性平等变成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之后,当身居偏远地带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加入这种诗学序列的时候,就更加丰富了当代女性诗歌的诗学资源。

本书抽取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人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如果说中国古代“受教育、应科举、入朝政等几乎一切户外活动即社会性活动的权利”被男权所垄断从而导致女性文学不发达的话,那么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似乎应该比通常所论的女性更为低下,这种低下首先来自少数民族文字出现比汉字晚。“我国民族文字比较发达的维吾尔族,六至十世纪时使用突厥文,八至十五世纪使用回鹘文,十一世纪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可见六世纪以前是没有文字的……藏文是在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才创制的。彝文是从世系推断产生于秦汉时期,但可确实认定的文献是在明代。蒙古族到十三世纪才有文字……”^①如果把这种文字出现早晚的现象按之于古代,以谭邦和在《媛诗九美》序言中的观点论来观之,这种结论就会成为必然。

由女性诗歌到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突出的是一种边界性的话语研究。这种边界可能是字面的也可能是比喻性的,当然,可能是实存也可能是象征层面上的。在面对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时候,我们发现,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形态,各种民族文化间的边界并非铁板一块、不可逾越,个体、性别、族群乃至国家间的身份边界在无形中慢慢走向消亡。如果以大文

^① 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